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王雨辰 主编)



The Logic and History of Capital Globalization

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与历史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

熊敏著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王雨辰 主编)

The Logic and History of Capital

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与历史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

熊 敏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与历史——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熊 敏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王雨辰主编)

ISBN 978-7-01-010341-9

I. ①资… II. ①熊… III. ①卢森堡,R. (1871~1919)—资本积累—理论研究 IV. ①F014.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8528 号

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与历史

ZIBEN QUANQIUHUA DE LUOJI YU LISHI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

熊 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240 千字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978-7-01-010341-9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代总序)

王雨辰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如果从徐崇温先生在 1982 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算起,至今也不过 25 年时间。然而,这 25 年时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认识不断走向深入的时期。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理论视阈的不断拓展,使得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三个突出特点:其一是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哲学理念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使得他们对于如何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分歧乃至激烈的争论。其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间出现了双向互动的格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更加深刻地研究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其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群体不断扩大,研究范围逐渐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回顾和分析上述三个特点形成的过程和所包含的信息,对于我们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我国学术界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上述三个特点,实际上也标识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按照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徐崇温先生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并非是出于理论自觉,而“从一开始就是由努力完成政治任务所带动起

来的：在1977—1978年间，胡乔木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后不久，找学术情报、哲学等研究所的领导前去领受任务时说，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我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①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关键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存在着双重的错位。从社会历史背景看，虽然经过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但总的说来我国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起步阶段，加上“左”的教条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现代性的批判等话语系统一时还很难为我国学术界所理解；从理论背景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正统，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反对这种解读模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看做是打了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即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引进和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性著作和代表性观点，为日后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一些准备性工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1986年以后，客观上要求正确认识和评价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哲学理念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批判地反思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体系的理论得失，体现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更深入的探索和理解。理论视角的变化，使人们对于如何理解、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学术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争论热潮，争论的目的就是要摆脱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中建构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图景。这场争论不仅使学术界熟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深化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且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影响，我国著名学者张一兵先生曾经指出：“最初接触这一新的理论领域，还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其时是在徐崇温先生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1982）

^① 徐崇温：《徐崇温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中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思想流派的。在当时的直觉中,有一种深深的震惊:研究马克思哲学还能这样出彩。”^①而为了获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权,迫使他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即“回到马克思”^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主体性问题”、“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人学”以及“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中,我们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③ 无论是否存在这种解读模式,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

进入到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具体体现在:一是研究主题进一步扩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技术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生态批判等,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共鸣,使得学术界从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一步扩展到研究其社会批判理论和现代性理论。二是研究方式从过去的宏大叙事转向了微观研究和追踪研究,学术界不仅出版多部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同时也出版了多部研究专题性问题、研究代表人物的著作。在追踪研究方面,分析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纳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阈中,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开始关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等,并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统称这些在后现代思潮中理解、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流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从而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

回顾我国学术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①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82 页。

② 张一兵:《深度解读: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动态》1999 年第 8 期。

③ 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三章。

历程,给我们比较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是:应当立足于怎样的哲学方法论来认识和评价不同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如果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模式,以此为裁判权,那么就势必不可能客观地看待和认识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是否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回答和解决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这事实上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会在实践过程中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流派发展是其必然结局。而这一切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本性使然。跳出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深入了解西方社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

但是,也需要指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也暗含问题。其一是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并由此引发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它到底是否反对列宁主义。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上的确和恩格斯、列宁是有差别的,但是“有差别”是否就是反对“列宁主义”,这是一个需要细致研究的问题。部分学者为了避免研究之前预先设定主观框架,于是用一个比较中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地域性概念代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有特殊内涵的,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产生,以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目的的一股思潮。只是后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教条主义的压制之下,才不得不在西方共产党外发展。不论其理论是否正确,但是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是对国外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各种理论思潮的总称。这其中既有同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流派,也有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还存在着仅仅只是借鉴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与马克思保持名义联系的后现代思想家。显然,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思潮在价值和意义上根本无法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其二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取得较大进展,但是并不能说已经很深刻。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题性问题

研究、人物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空白。事实上,学术界关注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群体在不断缩小,更多的是引进和评介 20 世纪后期出现的各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这种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是必要的。但是因此而冷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则是令人担心的,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是笔者所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的重要研究方向。自 1981 年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以来,就一直开设“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和研究方向。2006 年我们又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研究方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近年来我们先后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引进学术带头人和年轻博士,形成了学术结构和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团队,并把研究领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拓展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为主体,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学科点,被纳入学校“211 工程”建设项目。这套丛书就是我校“211 工程”建设项目的内在组成部分,其中的著作或者是我们学术团队部分教师的各级各类研究课题,或者他们的博士论文。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持续不断的出版和若干年的努力,不仅进一步搞好我们的学科建设,形成我们的学科特色,而且为推进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序

何 萍

熊敏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从读硕士研究生起,就致力于罗莎·卢森堡的哲学思想研究。在当时,要把罗莎·卢森堡作为一个哲学家来研究,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来自于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偏见,以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只有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本没有哲学理论,至少是没有创新的哲学理论,如果说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哲学,那也只限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葛兰西、柯尔施、卢卡奇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就是建立在这一理解之上的。在他们看来,仅仅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从世界观的高度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才能克服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从这一角度看,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没有贡献的,即使是他们中最优秀的理论家罗莎·卢森堡也不例外。另一个方面是罗莎·卢森堡本人并没有写过像卢卡奇以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的哲学专著,也没有像柯尔施那样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关系的讨论,更没有给马克思主义一个明确的哲学定位。这就使人们感到,把罗莎·卢森堡作为哲学家来研究存在着文本的空缺。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以往的罗莎·卢森堡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和政论领域,而少有研究罗莎·卢森堡哲学思想的专著,卢卡奇对罗莎·卢森堡哲学思想的论述也只在她的总体性方法论上,并没有系统地阐发她的哲学理论。可见,要克服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偏见,把罗莎·卢森堡当做哲学家来研究,就必须开展对罗莎·卢森堡哲学理论的研究,而不是停留于对她的总体性方

法作抽象的方法论研究。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理论挑战。面对这一挑战，熊敏选择了以罗莎·卢森堡的政治哲学为突破口，力图从被人们当做纯粹的政论文献中提取罗莎·卢森堡的政治哲学思想。这就构成了她的硕士论文选题：《论罗莎·卢森堡政治哲学的理论视野》。在这篇论文中，她把罗莎·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定义为政治哲学的方法论，以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基础和框架，阐发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政党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民主观等，揭示了这些理论背后的哲学内容和理论根据。这篇论文的特点是勾勒出了罗莎·卢森堡哲学的整体结构，但没能对这个结构中的基础部分——资本积累理论作充分的研究。因此，硕士论文完成后，熊敏转入了对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研究，并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完成了她的阶段性成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著作就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在哲学和科学研究中，人们通常会遇到深刻性和完全性不能一致的矛盾。熊敏在撰写这本书时也碰到了这一矛盾。她要专注于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力图对这一理论作深入详尽的分析，就无法做到面面俱到，给读者一个完整的罗莎·卢森堡哲学观念，这在罗莎·卢森堡哲学研究尚不充分的今天，无疑会增加阅读上的困难。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我想借这篇序来谈谈我对研究作为哲学家的罗莎·卢森堡的几点看法，力图在完整性上勾勒罗莎·卢森堡的哲学观念。

一、为什么要研究作为哲学家的罗莎·卢森堡

2009年1月15日，是罗莎·卢森堡遇害90周年纪念日。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和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在柏林共同举办国际罗莎·卢森堡学术会议，并在会后组织代表们参观了罗莎·卢森堡在柏林的遗址。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柏林之行，有两件事对我的感触极为深刻：一件事是在参观罗莎·卢森堡大街时，我们观看了镶嵌在地上的一百根铜条，其中的每一根都刻有最能表达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名言。这一百根铜条是2006年镶嵌的，其目的是希望人们能够了解作为思想家的罗莎·卢森堡，

而不仅仅是记住作为革命家的罗莎·卢森堡。另一件事是我在会议期间买了 Jörn Schütrumpf 编的小册子:《罗莎·卢森堡,或自由的代价》。在这本小册子中, Jörn Schütrumpf 把罗莎·卢森堡列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少有的坚持民主和个体自由思想而又不屈从任何权威学说和偶像的思想家。他认为,马克思、葛兰西和格瓦拉也属这一类思想家,其中罗莎·卢森堡与葛兰西的命运最为相似:他们两人都没有掌握过国家政权,却又从来没有因独裁者或极权主义政权的诋毁而使自己的名字褪色。不同的是,葛兰西的思想影响知识分子已经有许多年了,而罗莎·卢森堡,人们只熟悉她的名字和命运,却很少了解她的思想和著作。她的这本小册子就是要改变这一趋向,唤起人们对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和思想的兴趣。^①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时间是2008年。我认为,这两件事传导了这样一个信息: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思想家正在检讨以往的罗莎·卢森堡研究。在他们看来,以往的罗莎·卢森堡研究都缺乏应有的历史高度,通常的研究情况是:作为革命家的罗莎·卢森堡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而作为思想家的罗莎·卢森堡却并没有被人们理解和认识,因此,重新研究罗莎·卢森堡的理论,给罗莎·卢森堡以应有的思想史地位,应该是当前罗莎·卢森堡研究的主要任务。几乎与西方国家的罗莎·卢森堡研究同步,中国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罗莎·卢森堡研究。2004年和2006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和武汉大学分别两次组织召开国际罗莎·卢森堡学术研讨会,自此开始,《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月刊》、《河北学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天津社会科学》、《山东社会科学》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中外学者有关罗莎·卢森堡研究的学术论文。这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和2004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清楚地表明了一个走向:罗莎·卢森堡的哲学思想研究已经多方面地开展起来,罗莎·卢森堡的研究水平由此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②这应该成为我们深化罗莎·卢森堡研究

① See Jörn Schütrumpf: *Rosa Luxemburg or: The Price of Freedom*, Karl Dietz Verlag Berlin GmbH 2008, pp. 9-10.

② 详见何萍:《“罗莎·卢森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载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9—435页。

的基础。

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种种批判和误读之后还不断地被提起、被反思,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反思的现象。人们在反思这一现象时,通常把罗莎·卢森堡研究不足的原因归于列宁对罗莎·卢森堡的批评和斯大林对罗莎·卢森堡研究的禁锢。在我看来,这些都不过是一些政治上的原因,仅仅追究这种政治上的原因是不足以说明罗莎·卢森堡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因为罗莎·卢森堡不仅是一个勇于牺牲自己的革命家,还是一个富有激情、富有理性的思想家;由于她是一个革命家,对她的思想研究不能不受政治评价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她的思想价值又不允许也不可能由政治来裁决,而必须依靠学术认识的提高来解决。也就是说,人们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学术认识水平决定了罗莎·卢森堡研究水平的高下。这样一来,学术认识就成为了影响罗莎·卢森堡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并且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一个世纪的罗莎·卢森堡研究就是在政治因素和学术因素的交织中展开的,其中,政治因素直接的、最强烈的影响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而在此之前和之后,学术认识因素则起着主导作用,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罗莎·卢森堡研究完全是在人们折服于罗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精当分析和对俄国革命批判中所发出的种种预言中展开的。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追究政治因素对罗莎·卢森堡研究的影响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进行学术认识上的检讨。

从学术认识的视角检视,我认为,罗莎·卢森堡研究中的一个致命缺陷是人们只看到了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罗莎·卢森堡、作为政论学家的罗莎·卢森堡,而没有看到作为哲学家的罗莎·卢森堡。正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人们不能理解罗莎·卢森堡为什么要修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模式,不理解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批评和有关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的观点,因而也就不可能走进罗莎·卢森堡思想的深处,揭示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贡献。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20世纪初来自第二国际内部对罗莎·卢森堡的批评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罗莎·卢森堡的肯定就一目了然了。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时期的罗莎·卢森堡研究为例,是因为这些研究或者出现在列宁和斯大林批评罗莎·卢森堡之

前,或者出现在批判斯大林主义之后,根本谈不上受列宁和斯大林批评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个不受政治因素干扰的环境下分析罗莎·卢森堡研究在学术认识上的缺陷。

1913年,罗莎·卢森堡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资本积累论》一出版,就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日报《前进报》上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对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书展开了批评。罗莎·卢森堡看了这些评论后,十分惊奇。她并不惧怕批评,却对这些评论只是纠缠政治经济学的细节,比如对数学计算公式的合理性、市场和竞争、个别资本家生产的追究等,而不能进入她所研究的问题本身感到非常沮丧。为此,她写了《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马克思的信仰者怎样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一书。在该书的开篇,她指出,研究资本积累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探索这些资本主义积累——通过逐渐扩大生产积聚资本——的看不见的客观规律”^①。这与马克思《资本论》提出研究支配资本主义发展的“铁的必然性”^②问题是一致的,并且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基础的。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所建造的数学模式只论及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没有论及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因此,它对于资本积累的研究来说,又是不完全的,她修改马克思的数学模式不过是为了深化马克思有关资本积累的研究。与这一目的相比,运用数学模式只是外在的东西,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的需要,并不是问题本身。然而,批评者却把这些数学模式当做问题本身,并以个别资本家的生产以及他们之间的竞争来讨论数学公式计算的合理性,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看做是对经济现象的分析,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经济规律的研究。这纯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知。罗莎·卢森堡的这一反驳在她和她的批评者中划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她的《资本积累论》是力图解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一个问题,是一部哲学的著作,这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而她的批评者则把这部著作当成了纯

① [德]罗莎·卢森堡、[苏]尼·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粹经济学的著作,只在其中的数学公式和一些经济问题的细节上打圈子。这就是罗莎·卢森堡的批评者不能理解罗莎·卢森堡的根本原因所在。

与20世纪初的罗莎·卢森堡研究相比,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一轮罗莎·卢森堡研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这种实质性的进展是从研究态度上的根本性转变开始的。20世纪初的罗莎·卢森堡研究态度在总体上是否定性的,肯定的评价是罕见的,而20世纪90年代的罗莎·卢森堡研究态度在总体上是肯定性的,批评的评价已经成为了次要的方面。^①由于研究态度的变化,罗莎·卢森堡研究的理论领域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时,人们不再满足于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领域评价罗莎·卢森堡思想的价值,而是结合当代的全球化运动和新社会运动探讨罗莎·卢森堡的世界历史理论和总体性的方法论。这就使罗莎·卢森堡研究从具体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科定位提升到抽象的哲学方法论的学科定位。这种学科定位的提升又深化了对罗莎·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以2006年武汉大学举办的“罗莎·卢森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学术论文为例,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学者们从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列宁思想比较的视角研究罗莎·卢森堡的非西方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分析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贡献、与列宁思想的差别及其各自的理论得失,研究罗莎·卢森堡理论的波兰之根、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等等;在政治学方面,学者们研究了罗莎·卢森堡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观点、罗莎·卢森堡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和群众观念、民族与国家理论、解放哲学等。这些研究反映了罗莎·卢森堡研究的当代水平,凸显了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对于罗莎·卢森堡研究的意义。

然而,把哲学的方法论运用于具体的学科研究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一个功能,即指导、运用功能。研究这一功能,只能提升马克思主义在具体理论学科领域的研究水平,却不足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

^① 对于这种研究现状的详细分析,见何萍:《是“回到马克思”,还是走向“马克思主义”——从罗莎·卢森堡哲学的魅力谈起》,《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

观,更不能担当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变革的任务。要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变革,就必须把哲学的方法论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之中。这是哲学方法论研究的另一个功能,即理论的功能。通常,一个富于思想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总是在哲学方法论的这两个功能的交替作用中开展自己的研究。马克思是如此,罗莎·卢森堡也是如此。就罗莎·卢森堡本人来说,她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都是服从于她的哲学创造的,是服从于她创造一种能够揭示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历史规律的新理论这一目的的。然而,迄今为止的罗莎·卢森堡研究恰好缺失了这一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罗莎·卢森堡研究能高于20世纪初的罗莎·卢森堡研究水平;是因为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只是相对于罗莎·卢森堡把哲学方法论运用于具体学科研究这一个功能而言的,并没有进到对罗莎·卢森堡实现哲学理论变革的研究之中。所以,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罗莎·卢森堡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研究的状况依然不尽如人意。2006年以来,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思想家对罗莎·卢森堡研究状况的检讨,严格地说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的。在这种情况下,若要在实质上推进罗莎·卢森堡研究,就应该研究罗莎·卢森堡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功能,研究罗莎·卢森堡是如何通过资本积累的研究而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又是如何把新的哲学方法论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而创造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展示出一个哲学家的罗莎·卢森堡。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研究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比研究她的哲学方法论更为重要的方面。

二、罗莎·卢森堡的哲学思想传记

在罗莎·卢森堡的研究中,已经有了很多的罗莎·卢森堡传记。但是,这些传记对于研究罗莎·卢森堡的哲学思想作用甚微,因为这些传记主要记叙的是罗莎·卢森堡的革命经历,实际上是一些革命传记,因此,要

研究作为哲学家的罗莎·卢森堡，必须从重新书写她的传记开始。这是由罗莎·卢森堡所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类型决定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职业革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另一类是作为职业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两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表达他们哲学思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通常，第一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哲学创造是围绕着他们的革命任务展开的，他们的全部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服从于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需要，因此，他们表达哲学理论的方式也要服从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需要，甚至要根据他们论敌的理论表达方式来确定，或者撰写严谨的哲学理论著作，系统地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者以政论和辩论的方式撰写自己的哲学理论著作，突出对某一问题的深刻分析，比如罗莎·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或者以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的形式阐发有关资本主义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哲学观点，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都属于这一类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也同时是他们的哲学著作；或者以书信、札记的方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第二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哲学创造主要是围绕着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任务展开的，他们也关注现实，也要解答时代的理论问题，但他们关注现实和解答时代的理论问题，从根本上是服从于理论创造的，是服从于建构新时代理性的需要的，与之相应，在哲学理论的表达方式上，他们总是追求严密、系统的哲学论证方式，即使关系到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也都力图以哲学的方式加以叙述，或作为哲学的个案进行分析，因此，他们的著作都是以纯粹哲学的书写方式出现的。由于这一差别，对待这两类哲学家，人们必须采取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向。对待第一类的哲学家，人们不能仅仅读他们写的书，而且还要研究他们读过什么书以及他们如何读这些书、如何评价这些书，通过比较他们写的书与他们读的书之间的差异来把握他们的哲学气质和哲学品格，进而研究他们的文献，从中发掘他们的哲学思想，加以阐发。这样一来，研究这类哲学家的生平、所从事的革命经历和思想创造过程就变得十分重要了，甚至对他们生平、革命经历和思想创造过程的研究角度都直接

影响到对他们哲学思想理解的深度。相比之下,对待第二类的哲学家,人们可以直接从阅读他们的哲学著作开始,从他们的哲学著作中领悟他们的哲学,走进他们的时代。

在这两类哲学家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显然属于第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罗莎·卢森堡也属于第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是在对他们哲学思想的研究上,罗莎·卢森堡却遭遇了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命运。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人们经过了对他们是否是哲学家的争论和探讨,并在这种争论和探讨中对他们的生平和包括哲学著作、政治经济学著作、历史学著作和笔记、书信等大量文献作了充分的哲学研究,确立起他们作为哲学家的地位和哲学品格,多向度地阐发了他们的哲学思想。但是,对于罗莎·卢森堡,人们从来没有正视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问题,即使有人提出了这一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以公开、明确的形式展开讨论。因为缺乏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所以,罗莎·卢森堡作为哲学家的地位始终没有确立起来,即使涉及她的哲学思想的论述,也都只是分析她的有限的哲学论著,或者对她的某些思想作辩证法的方法论说明,并没有从她的生平、她的全部革命经历和理论创造活动入手,分析她的哲学品格、她特有的哲学表达方式,进而达到对她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文学评论、政论文章以及她的书信等文献作哲学理论的研究。这正是罗莎·卢森堡的哲学思想不能充分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想克服罗莎·卢森堡研究的不足,充分地展示她作为哲学家的气质和思想,我们有必要从哲学的角度重新思考她的革命经历和所从事的理论创造活动。

罗莎·卢森堡是波兰人,她出生的年代正是波兰王国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波兰无产阶级成长的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波兰王国在工厂企业、法庭、行政机关和教育等领域推行全俄罗斯化的政策,使波兰的自主权和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从而激起了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强烈的抵抗情绪。在这种环境下,波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党”的理论家们围绕着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的关系、争取民主的斗争与争取民族自主权的斗争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从而创造了自己的理论传统。概括起来,这个传统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其一,坚持